
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： 推动我国两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

邹国忠

编者按在我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，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曾发挥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，舆论界和理论界对两种模式的讨论甚至争论也持续了很多年。如何认识两种模式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，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，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。现特刊发原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局长邹国忠 2003 年就此问题的一些思考与看法，以飨读者。

苏南模式——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

笔者的家乡无锡县（现无锡市锡山区），是公认的我国乡镇企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，在那里笔者工作了十多年，1977 年底起先后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和农村工作部工作了 16 年，1993 年秋起调到江苏省乡镇企业局担任领导职务。

对于多年来被普遍关注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问题，笔者这样看，穷则思变，人们都希望找到一条新路子，加快工业化，实现民富国强。哪里在这方面有突破，人们的眼光就集中到哪里。苏南社队企业率先兴起，渐成气候，人们就往苏南跑，记得 1975 年全国各地就有 18 万人次到无锡县参观学习，这个参观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

温州搞个体私营经济，在当时的体制和政策下当然是“资本主义”了。不过，实际上批苏南在前，比批温州要早十几年时间，认为苏南搞的是“挂着集体旗号的资本主义”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批到八十年代初，后来才迎来好评如潮的“春天”，当然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“春天”也改去温州了。

其实，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上讲，两个模式触痛的是同一根神经，即“一统天下”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，过去把这两个“一统天下”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，谁触动它谁就得挨批。还有，就是农民搞工业，又触动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。

苏南的社队企业是集体所有制，为何公有制还挨批？具体来讲有三个原因：

一是因为它冲击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。几十年都是城市搞工业，农村只能搞农业，而且是“以粮为纲”，否则就是不务正业。当时把种双季稻称为革命稻、方向稻、政治稻。社队工业起步时，基层只能偷偷地搞，后来则加了许多限制，如乡村主要干部不能搞企业，农忙时企业职工必须回家务农。那时在苏南流行一句话，叫“粮食减产，工业犯罪”，粮食要是减了产，就会被上纲上线，批你“以钱为纲”“以工挤农”。想搞一点工业，就必须保持粮食年年增产，减产了怎么办，许多地方就多报一点饲料粮，反正猪八戒不会告状。

二是因为它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。社队企业的能源、原材料采购，项目的投资、建设，以及产品的生产、销售，因为进不了国家计划，就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寻找出路，用“四千四万”精神搞市场调节，但市场调节搞得越成功，就会被认为对计划经济的破坏越大，因而不断地受到批判，说是搞“四大自由”，即自由采购、自由生产、自由销售、自由分配，挖计划经济的墙角，走资本主义道路。在谈到社队企业时，还有人会说无锡县的供销员满天飞，钻计划经济的空子，甚至用漂亮女人搞供销，搞不正之风。

三是因为它冲击了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体制。苏南农村工业起步时，由于绝对不准搞个体私营，就选择了公有制在农村的主流形式，即以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区集体所有制，统称为社队企业。社队企业虽然受到种种批判与压制，但它一有机会就快速发展，在工业中的份额不断上升，随之“以小挤大”（指社队工业挤了国营工业、小公有挤了大公有）的批判声浪就滚滚而来。此外，许多社队企业起步时，除了集体给一块牌子、一块地，有的还给几间房子外，部分甚至全部原始投资来自农民个人，可以说是“公私合营”，有些企业仅仅是戴集体“红帽子”的个体私营企业，一旦被上面发现就批得更惨了。

当时有句话叫“在夹缝中求生，在批判中成长”，说的就是苏南社队企业。这个状态恐怕是所有先行者必经的痛苦与考验，新生事物成长的必然规律。

苏南模式有两大历史性贡献：

首先，苏南模式是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。它率先冲击并部分挣脱了旧经济体制的束缚，成为“在旧经济体制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”，在它的带动下，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“社队企业要有个大发展”后，社队企业成为全国农村工业发展的主流模式，“大搞市场调节”的星火在八十年代就迅速成为燎原之势。

其次，苏南模式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，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。先苏南，后江苏，再到全国，农村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份额之所以能从微不足道到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再到“半壁江山”，主要靠的就是社队工业的大发展。没有苏南模式，我国的工业化、现代化进程恐怕至少得推迟 10 年时间。

这两大历史性贡献，应该充分肯定。

温州模式——我国第二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

笔者第一次去温州是 1982 年，考察了一些地方，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已初步形成，但假冒伪劣的不少；温州当地做鞋子的作坊更多，有的老板自嘲生产的是“晨夕鞋”，意思是早上穿晚上就坏了；走在大街上，会有人追上来问你要不要手表（走私货），还听说有的地方“私人钱庄”很活跃。

时任温州地委秘书长说，个体私营的“地下经济”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形势松一些时就浮到地面上。其原因，一是温州人有根深蒂固的经商传统，二是“这里的民主革命就不彻底”，三是 Ip 家很少在温州投资，因而“全靠自己救自己”。可以说，解放后潜行在国家经济体制边缘或之外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，虽步履艰难，但一直或明或暗地发展着，积蓄着它的力量。

那时正是苏南模式的“春天”。但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1992 年笔者第二次去温州时，那里的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央“补充论”政策的空间里快速发展，在全国已产生很大影响。随着温州经济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上的相对优势越来越明显，就逐步出现了两种模式谁对谁错、谁优谁劣的广泛争论。实际上，人心已开始从苏南模式转向温州模式了。

争论的核心问题，是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。当时的主导舆论认为，苏南模式也搞“一包三改”等改革，但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，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，而温州模式主要是个体私营经济，滑向了资本主义。争论很激烈。在浙江绍兴考察时，就有人对笔者说，宁绍地区（宁波、绍兴）和江苏一样，都是苏南模式，温州模式算什么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挺住！

说这个话是在 1992 年秋天，实际上宁绍地区和苏南地区已经在探索股份合作制。因为温州经济不仅发展快，而且效益明显比苏南高，都有些坐不住了。

苏南乡村集体企业的改革磕磕碰碰，搞了好多年。因为改革触及到了所有制这个敏感问题。从观念到政策到感情，都要转很大的弯子，加上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，所以苏南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步履艰难，直到 1997 年党的十五大后才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
然而，那时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照常快速发展，对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，形成了各地纷纷去温州参观学习的热潮，各省的城乡个体私营经济也程度不同地加快了发展步伐。就是说，对我国第二波市场取向的改革而言，温州模式已经从悄然前行的潜行者成为影响全国的先导力量。“白天当老板，晚上睡地板”

“敢为天下先，特别能创业”，温州商人成为敢于创新，艰苦奋斗精神的典型代表，小商品大市场、小产品大行业、小资本大集聚……甚至催生了旅游项目“温州经济探秘游”。

苏南模式是“在旧经济体制的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”，它引发的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的改革，还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旧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。温州模式则是“在旧经济体制边缘或之外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”，它引发的第二波市场取向改革，冲破了旧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，催生了我国新经济体制的形成。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说：

一是它从更广泛的领域冲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。就是在发展农村工业的同时，以专业市场为载体，大力发展商贸业和相关的服务业。1992 年时笔者到过的义乌小商品市场、柯桥轻纺市场、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和桥头钮扣市场，已经形成很大规模，后来又持续扩张，2002 年笔者去义乌（系金华市下辖县级市——编者注）时听说常年驻在那里采购的外商就达 2000 多人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年在温州、台州等地进入房地产、金融、保险和风险投资业的民间资本也已形成不小的气候。

二是它以不断扩张的市场调节力量撼动了计划经济体制。温州模式在各经济领域快速发展，就是市场调节力量迅速扩张，市场调节迅速成为那里支配资源的主要方式。

三是它用地位迅速上升的民有民营经济重构了所有制格局。上世纪 90 年代初一位学者写的调查报告就披露，温州工业、交通、商贸、建筑、服务等各个行业中，个体私营经济所占份额已达百分之七八十，就是说早已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。

可以这样说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是改革的产物，其历史性作用是一先一后发生的。

笔者个人认为，对我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真正产生全局性深刻影响的，一是苏南的社队企业，二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“包产到户”，三是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，四是深圳的特区经济。就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推动作用而言，苏南模式和小岗村包产到户可以归入第一波，温州模式是第二波，从深圳特区起步的对外开放则是第三波。这四个地方创新实践的成功经验，对不断推进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，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。

这里还必须着重指出，在此过程中，中央方针、政策的与时俱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比如从计划经济体制“一统论”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“主辅论”，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”，最终变为现在的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”；所有制体制从公有制“一统论”变为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“补充论”和现在的“重要组成部分论”，以及“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论”；城乡经济的“二元论”也正在向“一体论”发展。没有这一条，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格局是无法形成的。

与时俱进——两种模式在改革的深化中同向前行

当时的两种模式争论是推进改革的客观需要。这些年苏南、温州两地乃至苏浙两省都在改革的深化中同向前进，原有的模式界线也在一步步地从模糊中走向消失。

温州带动起来的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优势，是他们在乡镇企业经济总量赶上并超过江苏的根本原因。为此，苏南乃至江苏实行“双管齐下”的方针，大幅度调整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。一方面，通过多种措施，大力加快农民自办的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步伐；另一方面，下决心将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转为私营企业，经过四五年持续努力，确立了个体私营经济在全省乡镇企业中的主体地位。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增加值在全省乡镇企业增加值中的比重，1998 年浙江为 56%，江苏为 31%，江苏低 25 个百分点；到 2001 年时江苏就基本赶上浙江，仅相差 3 个百分点（浙江 66%，江苏 63%），2002 年这个比重达 79%，已超过浙江。与此同时，江苏将集体资本从乡村企业中逐步退出，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。2002 年全省乡村企业实收资本总额中，个人资本、社会法人资本和外商资本所占比重已上升到 63.5%，集体资本所占比重相应退到 36.5%，不过还比浙江高了 22.6 个百分点。

苏南、温州两种模式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改革产物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主要差别逐步地消失，反映了市场主体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法则的必然要求。长期从事农村改革研究和工作指导的老人杜润生在 1997 年时就指出：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实行产权改革的实质，就是要给群众一些财产，一些资源，一些手段，使他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主要差别，就是这些财产、资源和手段，于苏南主要在政府和集体手里，于温州主要在老百姓手里。所有制和产权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，市场经济包含民营经济、差别经济。现在，不仅城乡集体资本大部分从企业退出，而且许多国有资本也开始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退出，根本原因就在这里。顺便说一下，国营企业、国营经济早已改称“国有”了，而民营企业、民营经济还没有改称“民营”。“民营”与“民有”，一字之差，有本质的不同。财产关系不清，是无法搞市场经济的。

至于说到“苏南模式”是不是已“终结”，这并不重要。两种模式本来就是相对存在的，如果说一种消失了，那就意味着另一种的相应消失。事实上，无论苏南、江苏还是温州、浙江的乡镇企业，近几年都把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、发展规模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，而且都取得了很大进展。

发达国家已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，从市场化走向全球化，确实是时不我待。中央强调加快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，针对的就是这个情况。从经济体制创新来说，深化市场主体、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重，时间拖得越长，改革的成本就越大，一些存在的问题必须抓紧研究，加快解决。笔者以为，中央为何强调体制机制创新，就是不仅要把已有的改革不断深化，还应进一步扩大改革的领域，加快全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。